

高教信息

第 15 期

太原理工大学发展规划处 主办

2017 年 12 月 10 日

要 目

P10 周云：学位点申报更重要使命是引导日常办学

与在办学实践中形成的重科研、轻教学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在舆论场，似乎又在另一个方向“一边倒”，推出了几个只搞教学不搞研究的典型人物加以褒扬，有教学唯大的倾向。这是对当前不正常现象的一种批判，但实际上却是人为地制造教学与科研的对立，这又是一种偏颇。

P17 林建华：“双一流”和学科建设的根本

我们开展“双一流”和学科建设，最根本的是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释放大家的创造潜力，使“近者悦，远者来”，聚集最优秀的人才，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P32 张立迁：研究生教育学之省思

研究生教育学是适应了知识发展、学科发展和现实发展的三重需要的应需之举，以“有为”争“有位”。唯有立“学科”之位，对研究生教育开展系统而专门的“学”研究，才能构筑起自成体系的“家园”，助力于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支撑研究生教育强国体系建设。

目 录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刊)

学位点建设

- P1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出新规
P4 高校学位点动态调整过程中的多重博弈
P8 高校抢人才仅为过学位点评估,得不偿失
P10 学位点申报更重要使命是引导日常办学
P12 如何看待大规模增设硕博点

学科建设

- P17 “双一流”和学科建设的根本
P19 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孰轻孰重

他山之石

- P25 天大教改 2018 年起全面实施大类招生
P28 深化创新能力培养,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研究生教育

- P32 研究生教育学之省思
P37 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范畴与构建理念
P47 研究生教育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图书推介

- P52 李培根:《认识大学》

主办:太原理工大学发展规划处

主编:王宝俊

编辑:王晓敏

排版:薛姣姣

邮箱: dpo@tyut.edu.cn

电话: 0351-6010886

出版日期: 2017 年 12 月 10 日

(第 015 期)

仅供内部参阅,正式引用时请自行核实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出新规

教育部新闻办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办法》明确，新增学位授权审核侧重于增量结构调整，每3年实施一次，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侧重于存量结构优化，每年开展一次。同时，放权部分学位授予单位自主开展新增博士硕士学位点评审。《办法》有哪些亮点？一起来看看！

放权部分学位授予单位自主 开展新增博士硕士学位点评审

《办法》明确，符合申请基本条件的学位授予单位可向省级学位委员会提出开展自主审核新增学位点申请。省级学位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核查后，将符合申请资格的学位授予单位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评议后，经全体会议同意，确定自主审核单位。

自主审核单位新增博士硕士学位点审核标准应高于国家相应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的申请基本条件。

自主审核单位每6年须接受一次评估。对已不再符合申请基本条件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取消其自主审核学位授权点的权限。

存在以下6种情况之一 学位授予单位暂停新增学位点

生师比高于国家规定标准或高于本地区普通本科高校平均水平；学校经费总收入的生均数低于本地区普通本科高校平均水平；研究生奖助体系不健全，奖助经费落实不到位；研究生教育管理混乱，发生了严重的教育教学管理事件；在学位点合格评估、专项评估、学位论文抽检等质量监督工作中，存在较大问题；学术规范教育缺失，科研诚信建设机制不到位，学术不端行为查处不力。

《办法》有哪些制度创新

一是加强授权审核制度的整体设计。着眼于供给侧改革，统筹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授权，同步开展两类学位授

权；建立常态化授权审核机制，将学位授权分为新增学位授权审核和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两部分，新增学位授权审核侧重于增量结构调整，每3年实施一次，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侧重于存量结构优化，每年开展一次；进一步明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省级学位委员会和学位授予单位的职责；进一步明确授权审核范围，新增单位原则上只在普通高等学校范围内进行，新增学位点原则上不接受已转制为企业的学位授予单位的新增申请。

二是突出质量标准在授权审核中的主导作用。提高授权审核的准入门槛，改变过去分配数量指标的做法，按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新增博士硕士学位点和自主审核单位分别制定更加细化、水平要求更高的申请基本条件。充分发挥学科评议组和专业学位教指委在授权审核中作用，严格按标准和程序实施审核，保证学位授权审核质量。

三是确立以省级学位委员会为主的审核模式。审核重心逐步下移各地区，各省级学位委员会负责本区域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规划、建设和申报指南编制，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托接收单位申请，组织实施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和新增博士学位点的初审，新增硕士学位

授予单位和新增硕士学位点的审核，在此基础上择优推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授权审核政策和各类授权审核条件的制定，以及最终授权审核结果的批准。

四是强调授权审核与结构优化、研究生培养和资源配置的衔接，从严控制新增学位授予单位数量和增长速度。充分考虑高等教育办学层次结构，合理确定普通高等学校的博士、硕士和学士三级学位授予单位的比例。对现有研究生培养质量不高、教育资源配置明显不足、现有学位点师资队伍支撑有困难的单位，原则上不再接受新增学位授权申请。

五是进一步激发高等学校办学活力。放权部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自主审核，每年可自主新增学位点，可根据学科发展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探索设置新兴交叉学科学位点，为其开展高水平研究生教育创造良好环境。同时，对这部分单位提出更加严格的制约措施，要求其学位点审核标准必须高于国家规定的申请基本条件，新增点6年内必须达到相应水平，不能突破质量底线。

六是加大对授权审核的监管处罚力度。适当增加公开环节，加强社会对审核工作的监督。加强授权审核与学位点评估和研究生培养的有效衔接，新增学

位点 3 年后必须接受评估，评估不合格的点 5 年内不得申请增列，对研究生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培养问题较多的单位，将暂停其新增申请。强化权责一致，各单位在获得授权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对材料弄虚作假、违反纪律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

后续工作还有哪些考虑

1. 制定了《学位授权审核申请条件》。从办学定位、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条件支撑等方面分别制定了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自主审核单位、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的申请基本条件，强化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衔接。

2. 抓好《办法》的落实工作。进一步加强省级学位委员会的统筹作用，要

求各省根据本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和研究生教育需求，制订本区域新增学位授予单位发展规划和新增学位授权点申报指南，确定发展重点，引导区域内学位授予单位特色发展，切合需求，避免重复建设。

3. 按照《办法》启动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按照《办法》规定的周期，定期开展新增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和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同步开展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授权审核，引导学位授予单位有序发展，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适时组织人员对各省（区、市）学位授权审核工作进行督查，保证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有序实施。

—摘编自《微言教育》2016.03.30

高校学位点动态调整过程中的多重博弈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 张端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公布《关于下达 2016 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全国共有 25 个省份的 175 所高校撤销 576 个学位点，包括大量博士学位授权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事实上，高校学位点动态调整堪称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其背后的多重博弈，充分体现了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步履艰难。

学位点动态调整长期处于博弈困境的状态

以质量为导向的学位点动态调整是国家意志，这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在国际上，一个学位授予点本质上就是一个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项目 (Program)。这些培养项目自然是动态调整的，如果招生、就业不理想，自然就会被淘汰掉。

相比之下，中国的博士、硕士学位点富含了更多的组织含义。从组织形态上来看，学位授权点包括了学科带头人、学科师资梯队、研究生、科研平台、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等等，体现了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特征。每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学位授权点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正是由于这种高度的组织化，导致中国高校的学位授权点体现出了“固化”的特点，即高校自身很难根据人才市场和学术研究的动态变化来及时对学位授权点做出调整。

比如，有的学位授权点发展态势不理想，却因为学位点学术人员的防卫心理而拒绝调整。因为，一个学位点的存在，往往会成为学校资源配置的一个基本单位。一旦这个学位点失去了，原有的学术人员就会面临“寄人篱下”，甚至“走投无路”的困境，所以弱势学位点的学术人员往往对此忧心忡忡。从学校的角度而言，要想调整一个学位点，就意味着要跟一个利益共同体进行博弈。

学位点的动态调整一直以来都显得非常困难。一旦学位授权点固化，就会

出现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下滑、学位点却依然苟延残喘的现状。这一方面导致了学校办学资源的稀释，也导致了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调整博弈：拿到多年想为而不能为的“尚方宝剑”

所以，学位点的调整不仅仅是高校自身改革的一部分，更加是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一环，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共同推进学位授权点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步骤。

对高校而言，这也是更好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学位点不断生长，再通过高校合并等途径，学位点数量往往相当众多。就像一颗大树自由生长到一定程度，需要对枝枝蔓蔓进行修剪才有助于其进一步成长一样，学位点调整是高校依托学位点动态调整政策，主动对自身进行学科结构进行优化的重要契机。

早在2014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开展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试点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要限制增列当前培养规模偏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学科为学位授权点。它就已经为此后较大规模的学位点动态调整埋下了伏

笔。2015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发文，决定从今年起将“动态调整”的实施范围由此前的“试点”扩大到全国。通过这种动态调整的政策，辅助重点学科建设政策和学位授权点评估政策，赋予了高校进行学位点动态调整的“尚方宝剑”。如此一来，一些发展状态不理想的如果学位点拒绝调整，一旦在学科评估中结果不理想，就会面临被动被调的窘境，主动调整或许还可以重组进一个稍微理想的学科，被动调整则将彻底失去进退的主动性。

因此，本轮较大规模的学位点动态调整本质上是国家的学位点调整政策、学位点评估政策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投入政策相互配合，共同打出的强力“组合拳”。这套“组合拳”将原有的博弈困境彻底打破。学位点的动态调整，有助于高校将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培养定位、办学特色和发展方向，优化学科布局，发展有竞争力的学科体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从被动“扛”到主动“调”

在新的博弈逻辑下，学院和学科过去“被动扛”、“拒绝调”的态度也只能发生根本改变。弱势学科如果不能顺应国家导向和学校政策，继续“扛”下

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动性的面临彻底淘汰。这些学位点的原来思路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学位点，即便再弱势也能多少吸纳到一点学校层面的资源。即便有的重点大学的弱势学科在 211 和 985 的三期建设中没有拿到过学校一分钱的学位点建设经费，最最基本的运行费总是能够保证的，总还期望着在其他学科被“喂饱”后，总有一天能轮到自己。现在的预期彻底改变了，从学校层面获得后续投入已经成为不可能，学位点内部的学者也由于担忧自己的前途而转投本校的其他学科，或者“跳槽”到兄弟高校的相关学科。

院系是学校的二级学术组织，在学位点建设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一个学院有多个学位授权点，对于这个学院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是内部进行资源重组。将少量相关弱势学科的学者归并到强势学科，可能可以在学位点评估的某一个指标上有所改进，并且从此再也不会面对学校层面“调整、调整、调整”的“紧箍咒”。因此，这部分院系就成为了配合和推动学位点动态调整的关键力量。如果一个院系建设一个学位点或者多个院系共享一个学位授权点，它们万万也不能接受被调整的厄运。多数高校自然也会在本轮调整中给这部分

学科以喘息之机，期望他们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进一步把握机遇。但是从国际上看，顶尖高校的二级学院数量一般在 6-14 个，这样的管理幅度是适中的。面向长远，将更多的学位点纳入大学院内部进行管理或将成为高校未来的改革趋势。

学位点动态调整过程中的 功利性“错杀”

本轮学位点动态调整有着良好政策设计，也通过学位点投入政策和学位点评估政策打出了漂亮的“组合拳”。但应该看到，其中也不排除部分高校出于一定的功利性目的，只保留强势学科，借机清除弱势学科的做法。其实，有些弱势学科恰恰是高校学科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才培养所必备的基础性学科。功利性“错杀”，可能会导致人才培养的结构性问题。而这种“错杀”的决策者恰恰是优势学科在学校决策层的代表，这是部分高校需要去反思的。

美国康奈尔大学提出过一个办学理想，即任何一名学生在这里都可以学到他想学的专业。康奈尔特别强调的一个因素就是常规课程的深度和广度，这其实是个很大的理想，体现了大学 (University) 追求理解整个宇宙 (Universe)

一切现象的追求。如果一所大学的学科覆盖面不够宽，就很难完成这样的抱负。从这个角度讲，功利性的学位点“错杀”是非常短视的。为什么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在 ESI (基本科学指标)22 个领域能够实现全覆盖，并且每一个领域里都能够排到世界前列？如果缺少了一些主干性的学科，还可能实现覆盖吗？

当然，一所大学的发展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种不为的领域更加应该放在二级的细分领域，在学科大类上还是应该具备较强的覆盖面。只有这样才能成其为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比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等知名高校，在很多的学科小类上是不覆盖的，或者只在某个历史时期是覆盖的，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但是他在基本科学指标的 22 个一级学科领域一直都能够做到名列前茅。每一所学校都有自

己的主干学科和支撑学科，也都有自己的基础性学科和应用性学科，主干与支撑，基础和应用之间应当形成交错融合、互为表里、相互支撑的生态关系，而不应该成为生死存亡的竞争关系，甚至是斗争关系。

我国自从 1981 年建立学位制度以来，研究生教育经过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进入 2000 年以来，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学位授予国。近几年来，在国家的质量导向下，研究生学位教育正处于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型阶段。在今后的 一段时期内，学位点动态调整仍将是推动研究生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引导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强化办学特色的重要政策工具。

—摘编自《文汇报》2016.11.04

高校抢人才仅为过学位点评估，得不偿失

光明日报记者 史楠

随着高校的“抢人才”愈演愈烈，各方愈加关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此前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工作推进会上“东部各高校，请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之语，言犹在耳。可另一方面，有地方高校校长对记者直言：为了“双一流”，为了即将到来的“学位点评估”，虽然明知抢人是“双刃剑”，但也还要“抢上一抢”，让评估之前自己学校的人才“帽子”多一点，科研大牛“人头”多一些。但“挖人大战”背后的这个理由靠得住吗？

评估学位点与“帽子”“人头”无关

201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部署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和专项评估。根据该办法，合格评估主要面向获得学位授权满6年的学位授权点，每6年一轮，每轮前5年为学位授予单位自评，最后一年为教育行政部门抽评。目前，首轮合格评估还在自评阶段，预计2018年年底完成自评，2019年进行抽评。

专项评估主要面向获得学位授权满3年的新增学位授权点，主要检查参评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完备性，包

括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和质量保证等，以定性评价为主，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及“限期整改”三类，不对参评学位授权点水平排名排序。根据教育部信息，评估指标重点突出质量要求及保障条件的完备性、有效性，指标要素不设权重、不打分。其中，师资队伍主要检查参评学位授权点获得授权以来能够满足培养需要的师资的规模、结构、水平及培训等情况，师资水平一般通过导师的学历学位、专业技术职务、承担科研项目、所获学术成果和学术交流等指标反映，不数“帽子”也不查“人头”，各种“称号”人才并不纳入指标体系。

“双一流”面前，人才更需要的是“留住”

根据《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暂行）》相关内容，“双一流”遴选有两点特别之处：一是不再组织高校申报，不组织专家评审。有参与者对此评价，这样既能避免学校突击申报，也相对减少学校的负担；二是认定标准根据已公开发布、可公开获取、高校普遍认可的国内外第三方评价结果确定，突出人才培养质量、学科发展水平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与“数人头”“戴帽子”挂钩。这样做的目的，无疑也是为了避免高校面临“双一流”建设时片面追求数量指标，进而导致恶性争抢人才。

王瑞（化名）作为青年优秀人才，2014年被东部某高校挖走，但是现在她对记者说：“我要离开了，收入减少也

走。”因为配套的人才管理、项目和资金审批制度等问题，她负责的项目推动起来举步维艰。王瑞的窘境实际也是很多学校“抢人才”喧嚣之后的结局：抢来了留不住，留住了用不了，结果人才就只剩下“人头”“帽子”等短期的“书面材料中的价值”。

“人才评估不侧重‘帽子’‘人头’，而是侧重对人才的项目成果的评估，这才是好的导向。”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教授李焦明说。

据记者了解，“双一流”在后期建设中特别注重以高校综合改革带动一流师资队伍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水平提升、优秀文化传承创新、成果转化，引导推动高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避免高校的功利性行为和追求短期效应。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7.05.19

学位点申报更重要使命是引导日常办学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周云

学位点对于高校办学意义重大。学位点建设就像是一面旗帜，指引着高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方向和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学位点建设是高校最为核心的事务。这也是为什么学位点的层次、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高校办学水平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

日前，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公示了2017年新增学位授权单位和新增学位授权点的申报材料，11所高校申报新增为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全省31个单位申报新增314个博士硕士学位点。申报材料公示结束后，省学位委员会将组织专家评审组，对新增学位授权单位和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申请材料进行评议和表决。入选单位在公示无异议后，将按程序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关于学位点，在普通人的认知当中，可能大约就等同于硕士、博士的培养。这当然是学位点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又不仅限于此。实际上，学位点对于高校办学意义重大。学位点建设就像是一面旗帜，指引着高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方向和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学

位点建设是高校最为核心的事务。这也是为什么学位点的层次、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高校办学水平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一个紧迫的事实是，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广东学位点的现状，显示出广东高校的办学水平跟教育发达地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此次学位点的申报工作，既是对过去办学的总结，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布局，重在引导日常办学，促进广东高等教育提速，赶超国内和国际的高水平大学。

因此，争取更多的、层次更高的学位点，是申报工作的重要目标。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位点的申报，在思想认识上、实践上，更好地引导日常办学。比如说，对于如何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问题，学位点的申报就是一个非常

好的引导。如果说在普通人的认知中学位点相当于硕士博士的培养，那么在业内，又把学位点建设跟学术研究等同起来。这在实践中，难免会形成重科研轻教学。但是新一轮的学位点申报工作对指标体系做了比较大幅度的完善，教学方面占的权重有了提升，这必然会对以后的高校办学形成良好的引导作用。

与在办学实践中形成的重科研、轻教学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在舆论场，似乎又在另一个方向“一边倒”，推出了几个只搞教学不搞研究的典型人物加以褒扬，有教学唯大的倾向。诚然，这是对当前不正常现象的一种批判，但实际上却是人为地制造教学与科研的对立，这又是一种偏颇。而学位点申报，则在强化一种认识：学术研究是大学的责任。对于一个大学教师来说，学术研究也是职责所在，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可以协调的。投身于教学，并不是不从事学术研究的理由。这本身也是一种

常识，只是被人为地混淆并颇有市场。学位点申报，毫无疑问，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此外，通过学位点的申报，还能够引导人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大学除了教学与科研的任务，还要进行社会服务。当然教学和科研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服务，这里指的社会服务是狭义的，指大学走进企业、农村、机关，走进社会，直接进行服务。社会服务，说白了，就是让大学的知识生产发挥更大的效用，产出更大的效益。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认识，有很多人主张大学应该自觉地保持与社会的距离，避免急功近利，以维护知识生产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不能说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但笔者觉得如果所有的学科、所有的教师，都有意的保持与社会的距离，那么实际上是对社会投入高校资源的巨大浪费，因人而异、因学科而异应该才是合适的。

—摘编自《羊城晚报》2017.08.11

如何看待大规模增设硕博点？

中国科学报记者 温才妃

一方面，随着研究生扩招，学历含金量“缩水”，不合格的学科点被大幅撤销；另一方面，几轮下来，高校申报学科点热情不减。这又是怎样的申报逻辑呢？

“双一流”建设、学位点建设需要资金，高校要找出口；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政府也要找出口，几方面综合之下就出现了当下增设学位点、扩招研究生的局面。

“听说研究生要扩招，那是不是意味着机会更多？考研更容易了？”最近一段时间，各省、直辖市纷纷晒出了增设博士硕士学位点名单，各省动辄百计，不禁引发网友们纷纷讨论。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要求，各省、直辖市必须在10月31日前，将新增硕博学位点推荐名单报送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同时该名单进入公示环节。

据媒体报道，此次全国范围申报3000余个硕博学位点，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申报。虽然这并不是最后的

名单，且据悉“学位点的审核将严格控制”，但已有不少省份、高校在为此喜上眉梢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去年175所高校大幅撤销576个学位点，那场大规模的裁撤潮让不少高教界人士记忆犹新。

一方面，随着研究生扩招，学历含金量“缩水”，不合格的学科点被大幅撤销；另一方面，几轮下来，高校申报学科点热情不减。这又是怎样的申报逻辑呢？

难以抗拒的诱惑力

“研究生院召开学位授权点推进会，教师们纷纷准备材料，学校网站、社交媒体跟进增设情况。”北京某“211工程”高校教师卫谦如此描述这一轮高校申报学科点的热情。

实际上，学科点申报与裁撤所呈现的“大开大合”背后，有着高校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因为“没有学科点，教师的发展就会遇到瓶颈。这个瓶颈不解决，申报学科点的热情永远不会消减”，上海大学原副校长叶志明说。

他解释，教师的各类资源配置、教师的发展都是按照学科点情况来配置的，高校内如果没有学科或者专业支撑，这部分教师只能靠自己救自己，即办新专业或者学科点来实现。但如果没有足够的科研等依托，新办的专业或者学科点的人才培养质量就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当然，高校为了教师自身的发展，也会想尽办法增设学科点。”

卫谦补充，只有成为硕博学科点，才有可能获评各级重点学科、获得“双一流”建设等国家专项资金，从而谋求更大发展，这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条以学位点为起点的发展链条。因此，学科点是高校的必争之地。

学位点增加相对困难，但高校也有“曲线救国”的办法。学位授权审核包括新增学位授权审核和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两种方式。前者每3年实施一次，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部署；后者每年开展一次，由高校根据需求，自主撤销硕博学位点，新增不超过撤销数量的

其他硕博学位点。

卫谦表示，一些学科点被裁撤，招生、就业情况不佳是表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学科评估的需要——因为高校要集中力量办好优势学科而被“刷”下来。学校运用“动态调整”机制，撤掉一个学科点，相应地新增一个学科点。各学校都有一些热门专业，养了一批教师却没有学位点。此时，学校可能会“牺牲”一些人少的小学科，甚至有价值的小学科。“弃车保帅，解决一堆人的饭碗问题。”

不仅如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在增设学科点时，研究生院还会算经济账。在招生上，经济收益高的学科点往往会排在优先增设行列。一些有价值但在经济上不划算的学科点，导师甚至需要交钱给研究生院招生，因为财政上没有公费招生指标。工科有更多的项目经费，往往交得起钱招额外的学生；文科项目经费少，导师交钱招生的动力更不足。因此，研究生院往往会把文科招生指标撤掉，换成工科招生指标。

最大的受害者是学生

当学生们听闻研究生扩招，满怀欣喜报考时，他们不会去想，若干年后这个学科点有可能会消失，也不会去想扩

招带来的学历贬值问题。而最后需要为此“买单”的人，也只有他们自己。

大规模增设硕博学位点，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伴随着数量的增加，人才培养的质量很容易出现下滑。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中已经出现了。

储朝晖指出，一方面是师资，一些博导、硕导自身并没有经过良好的学术训练，甚至连论文的基本规范都搞不清，让这样的教师带博士生、硕士生，质量问题只会愈加严重。

另一方面是，学生习惯于以知识考核为主的考试，进入大学后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培养起独立的思考和研究能力，从教育的分量上来说，再去读研是一种“过度教育”。“培养质量不高的学生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消耗，因为社会付出和收益并不相称。”

“研究生培养不顾质量会挤压本科教学，本科教学可能会成为高中的延续，变成考试分数、考研知识的培训班，造成学历贬值、混乱。后果将是几代人都改变不了的。”储朝晖说。

注重量而忽略质，在数量与质量的问题上，我国高等教育似乎从未找到平衡点。

在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

研究院研究员侯定凯看来，扩大规模与质量下降本身并没有天然的联系，学科点数量增加与否，从根本上要看社会需求，而不仅仅追求学科点自身的眼前利益。“先把摊子铺开再解决矛盾，不应是增设学位点应有的态度。”

然而，现实中又有太多只顾单边利益的例子。比如，近年来一直强调的专硕建设。“其矛盾在于：政府、高校可以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设计得很完美，但是新增学科点的知识体系、师资结构依然是面向过去学术型的，同一拨人、同一教材体系、同一课程设置，并没有结构性的变化，这样的专硕人才培养质量可想而知。”侯定凯说。

行政主导下的无能为力

之所以在现实中形成重视学校、教师利益，而忽视学生利益的逻辑，从根本上说，是由行政主导带来的弊端。

目前，《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确立了由各高校上报增设硕博学科点，以省级学位委员会审核为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核准审核结果的模式。

这样一个流程也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相比之下，国外高校并没有全国性的要求，都是由学术委员会自行评估是否需要增设、撤销硕博学科点，招生与

学校声誉直接相关，甚至一个不合格者的流出都会影响学校的声誉。

“先定调子再做事，学术标准往往不好把握。就像当初高校扩招一样，政府提出扩招要求，高校纷纷走程序，没有人去问科学与否。”储朝晖指出，正因为没有人质疑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将更加严重。“‘双一流’建设、学位点建设需要资金，高校要找出口；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政府也要找出口，几方面综合之下就出现了当下增设学位点、扩招研究生的局面。”

而将审核的权力交给省级学位委员会，也带来了或多或少的担忧。

叶志明指出，省内统筹可以考虑地域的平衡关系，但也给国家层面的布局带来一定的不合理性。比如说，多省某一学科点都要求增设，从国家层面而言，该学科点存在增设过多的隐患。然而，省与省之间并无相互关联，考虑了一省的局部利益，全国的利益可能就要放弃。

“学位点放在当地审核，也很难保证专业性。当地高校要上博导、硕导，就有可能通过省级审核学位点增设的契机尽可能‘放水’，省级学位委员会为了本地高校能够拔得头筹往往也会网开一面。”储朝晖道出了担忧。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以上矛盾，唯有

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在本次采访中，专家们纷纷表达了这一观点，而同时又表示“无力改变”，毕竟行政化问题依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顽疾。

审核过程增加透明性

对于学科点申报与裁撤所呈现出的“大开大合”，从“大合”的角度倒推回去，也可以从问题中找到完善建设的一些思路。

在叶志明看来，申报与评估，一个是办学资格，一个是办学质量，学位点申报与评估的思路相通，存在的问题也是类似的。为了评估一个学科点，举全校之力去支持，将其他专业的资源拉入参评，这是高校“不可公开的秘密”。

“现在省级审核将程序公开，其好处在于大家可以监督高校在申报学科点时，是否存在上述造假行为。”叶志明说。

但仅仅公开了增设点，似乎还是不够。

在侯定凯看来，名义上邀请专家评审，但实际上仍然是由政府部门主导。

“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谁主导评审，而是学科点评审是否有可公开、完整的工作链条。评审过程的计划性、透明性很重要，只有透明了才可以监督，才能实

现对学科点建设从申请、评审、建设、评估等各环节的问责。”

他以撤销学科点的现象为例指出，当某一学科出现了重大问题，以至于必须给予警告或撤销之际，主管部门至少要做两件事情：第一，警告或撤销学科点的原因是什么，对涉事学科点或其他学科点有什么建议或警示，这些信息必须提供可公开、详细的调查报告，否则审查还是一笔糊涂账；第二，学科点发展出现了问题，须反思是否与当时设置

把关不严有关，导致在源头上潜伏了问题。

“学科点的问题是否也暴露了评审标准、评审程序上的短板？撤销也好，新增也罢，程序性公正是底线，问责也必须落实到学科点、评审专家和政府决策部门等各利益主体。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学科点发展大起大落，对学科本身和学生利益带来的伤害。”侯定凯说。

—摘编自《中国科学报》2017.11.14

“双一流”和学科建设的根本

北京大学校长 林建华

一个卓越的学术机构，要聚集最优秀的学者，并营造开放的学术氛围；卓越的学术机构，要涵育学术，并激励青年学者，使他们更好成长。

最近，国家开始启动大学的“双一流”计划，希望以学科为主线，通过加大投入、推进改革，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准和竞争力。

“双一流”的核心是学科的建设，要集中有限的力量和资源，使某些学科领域先发展起来，产生卓越的学术和教育。北大过去 20 年的发展，也是先从部分学科领域做起，树立起新标准，促使其他领域随之跟上。

上世纪 90 年代，有几位国外学成的经济学家，立志要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揭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建立起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北大，这批志同道合的同行创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从老地学楼的破旧房间起家，到重新设计和建设了朗润园，他们建设了可能是具有最优雅环境的经济研究机构。后来，经济研究中心更名为国家发

展研究院，研究领域拓宽到了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并做出了引领性的研究成果，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重镇。

是什么成就一个卓越的学术机构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应当是学者和氛围。

我们开展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拓展人类的认识边界，是要培养人，以保持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基础研究拓展了人类的知识边界，应用研究拓展了人类的能力边界。这个“边界”就是前沿。一个卓越的学术机构要有明确的使命，要担负国家和社会责任，不断产生能够促进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新思想、前沿科学或未来技术，还要不忘初心，始终坚守。在前行的路上，会遇到很多诱惑，使你偏离使命和初心。坚守既需要学者的视野、胸怀、勇气和担当，还需要优良的科研环境、完善的制度保障和

良好的学术氛围。

卓越的学术机构，要聚集最优秀的学者，并营造开放的学术氛围。我曾与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交谈，他认为，聚集最好的学者，并让他们一起工作和交流就可以产生最好的学术。思想上的碰撞，会产生新的学术，使大家都受益。良好学术氛围以及和谐共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是很值得赞赏和珍惜的。

卓越的学术机构，要涵育学术，并激励青年学者，使他们更好成长。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曾讲：不仅要依靠少数科学家的才能，而且要不断吸收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帮助他们熟悉科学研究方法，这样才能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青年人的贡献和成长，会使新的血液和新的思想源源不断地进入科学研究。当时在玻尔研究所学习和工作过的青年学者，如海森堡、泡利、狄拉克等，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成为最优秀的学者。世界上还曾有一批这样的学术机构，如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剑桥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等等。

过去 10 多年的“985 工程”建设中，北大始终坚持“以队伍建设为核心，以交叉学科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的思路，陆续新建了一些像国发院

这样的学术机构。例如，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环境和支撑条件都很好，使学者可以心无旁骛地潜心研究，一批青年学者很快成长起来。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PIIC）形成了很好的合作和协同文化，鼓励与不同专长的学者合作，在生物医学基础和应用领域都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人文社科研究院（文研院）是一个新建的机构，目的是要在人文社科领域“涵育学术，激活思想”。这些新的研究机构虽然只是在小范围内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但他们的学术标准，对卓越学术的追求，带动了学校的发展，也促使了其他院系的进步。

我们开展“双一流”和学科建设，最根本的是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释放大家的创造潜力，使“近者悦，远者来”，聚集最优秀的人才，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人们常讲：成功的特征都很类似，失败的原因却千差万别。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我们把“以院系和学科为基础”作为重要的指导原则之一，目的是要认真研究各院系的具体情况，针对院系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使更多院系成为卓越的学术机构。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10.09

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孰轻孰重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卢晓中

中国“双一流”建设，实际上也涉及到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关系问题，但这是在一种特定的政策话语背景下的关系认识，似乎与一般意义上的认识又有些许别样。这个“别样”主要是对“双一流”的建设对象作出一些策略上的划分，如有些大学要瞄准世界一流大学而建设，而有的大学则主要是致力于一流学科建设。这一策略上的划分也释放出以下信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一流学科建设还不是一回事，需要区别对待。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提出在“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的基础上，经过若干年努力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众所周知，“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一个比较的概念，也即它们是从大学之间比较得出的。而“比较”就有一个比较对象和比较范围，所以也就有了所谓的“世界一流”、“国内一流”等表达。具体而言，形式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源于大学排行榜，

即在人为设定的指标体系下排名靠前的大学和学科，因此从这一意义上，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形形色色的大学排行榜排出来的。这也是本文选择大学排行榜作为分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关系的主要依据。

“双一流”建设的制度设计有两大特点：一是在建设目标上将大学建设分类为大学的一流建设和学科的一流建设；二是建设的体制机制方面更注重建设绩效、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等。应当说，“双一流”建设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新形态，也是政府发展高等教育政策的新导向。实际上，“双一流”建设这一新形态和新导向隐喻了这样一个现实命题：大学建设

与学科建设既相关联又不相同，其中的“关联”表现在要“坚持以学科为基础”，而“不相同”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大学分类发展的建设思路，或者准确的说是一种“形而下”的建设方略。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关系问题，进而这一关系又与“双一流”建设的联系相联系。

对世界一流大学与 一流学科关系的认识

从一般意义来说，大学与学科的关系是比较明晰的，而大学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系也具共识，即一言以蔽之：“学科建设是大学建设发展的龙头”。显然，从这一认识可解读出大学建设与学科建设的高度一致性。对于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也与一般意义上大学与学科的关系认识并无太大差别。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一问题，可选择曾担任过著名大学的校长和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学者等几个有代表性的认识作一考察。如牛津大学前校长柯林·卢卡斯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依靠声望、知名学者、学术成就，且在各个领域都能表现卓越，但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能代表大学目前的发展的水平。北京大学前校长陈佳洱认为：美国的哈

佛、麻省、斯坦福，英国的牛津、剑桥，日本的京都、东京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大学培养了无数杰出人才，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曾出版过《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的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具有“普遍主义”的精神气质：教师的国际化；生源广泛、多样；课程教学、项目研究的世界性、普遍性。主持发布《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RWU）》的刘念才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些共同特征：世界一流的学科、世界一流的教师、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世界一流的生源和人才培养，世界一流的校长和管理水平，独特的办学特色和发展战略，强大的财政实力和优良的基础设施等。武汉大学邱均平在其《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竞争力评价报告（2013-2014）》中将前100名称为世界顶尖大学，101-300名称为世界高水平著名大学，两者合称为“世界一流大学”。以上认识虽不尽相同，但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是比较共同的：一是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是密切关联的，除了标明“世界一流的学科”这样的直接关联外，教师、课程、科研成果、学生质量等也都是学科的要害；二是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定，跟大学排行榜有较大的关系，如在世界

大学排行榜的前多少名才被认定为世界一流大学。

对于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的现实状态，本文选取最新发布的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RWU）、学科领域排行榜（ARWU-FIELD）；《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QS(Quacquarelli Symonds)世界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前 100 名的大学及学科进行考察，通过对比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有一流学科作为支撑，一流学科建设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

从大学排行榜排出的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现实样态来看，不论是何种大学排行榜，虽然大学排名与学科排名的名次，未必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总体来说呈正相关趋势发展，换言之，学科排名靠前的大学，大学排名一般来说也相对比较靠前，反之亦然。由此来说，一流学科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

实际上，从三大排行榜所设计的指标也可看出大学与学科排行密切相关：上海交通大学排行榜中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校友、教师折合数，各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的折合数，被

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量；《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中论文引用率及工业收入；QS 排行榜中教师论文引用率。无论是诺贝尔奖（和平奖除外）还是菲尔兹奖都是授予在某些学科领域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论文数量及引用率，这些指标也都是在特定学科领域中取得的科研成果。也就是说，世界大学排行榜指标中的学科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排名位次，学科水平提高了，这些相关指标的得分也会提高，世界排名位次就会随之上升。

2. 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并非都是世界一流

能进入世界前 100 名的大学，其学科不一定都能进入学科世界排行前 100。如在上海交通大学排行榜中，世界前 100 名的大学其中有 20 所大学的理科、工科、生命科学、医科、社会科学同时进入学科排行世界前 100，其他 80 所大学却不是所有学科都能进入学科世界排名前 100，如洛克菲勒大学、日内瓦大学等，虽然大学排名比较靠前，但都有不少学科排在 100 名以外；《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有 19 所大学的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社会科学、生命科学、艺术和人文、临床-预防-健康学同时进入世界

前 100 名，其他 81 所大学不是所有学科都能进入世界前 100 名。即使是排位第一的加州理工学院，其艺术和人文学科、临床-预防-健康学，都未能进入前 100 名。QS 排行榜中，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的所有学科全部进入世界前 100 名，例如有 10 所大学的艺术与人文学科不是世界一流学科，12 所大学的工程与技术学科不是世界一流学科。

3. 世界一流大学既与一流学科的数量关系密切，也取决于一流学科的质量

纵观三大排行榜排名前 100 的大学，有的大学，尽管一流学科的数量不多，但并不影响其进入一流大学的行列。以 7 所同时进入了三大排行榜前 10 名的世界顶尖大学为例，其中有 5 所为综合性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牛津、芝加哥大学，2 所为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与加州理工学院。这些世界顶尖大学的非一流学科都占到了一定的比重，仍然不影响其进入世界顶尖大学的行列。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一流学科的质量（包括学科科类、学科排名等状况）对于大学排名有时起着决定性作用。如在 QS 排行榜中加州理工学院的艺术与人文学科不是一流学科（100 位以外），社会科学的排位也不靠前（39 位），但它的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生

命科学分别排在第 1、2、5 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中，有 5 所进入前 100 的大学虽然只有一个学科领域进入世界前 100 名，但是学科排位都比较靠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科学排位 12，卡罗林斯卡学院的临床-预防-健康学排位 13；荷兰的瓦格宁根大学的生命科学排位 16；美国的埃默里大学的临床-预防-健康学排位 38，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临床-预防-健康学排位 27。上海交通大学排行榜中日内瓦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名古屋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仅理科为世界一流学科，其世界排位分别是 33、51-75、35、51-75 名。

中国大学一流大学与 一流学科建设的主要路向

如前所述，中国“双一流”建设，实际上也涉及到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关系问题，但这是在一种特定的政策话语背景下的关系认识，似乎与一般意义上的认识又有些许别样。这个“别样”主要是对“双一流”的建设对象作出一些策略上的划分，如有些大学要瞄准世界一流大学而建设，而有的大学则主要是致力于一流学科建设。这一策略上的划分也释放出以下信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一流学科建设还不是一回事，需

要区别对待。如果这种“区别对待”仅仅是出于资金资源投入上的“有限目标”及其绩效考核的针对性等这些策略方面的考量（因为资金资源总是“有限”的，从而决定了一定时期目标的“有限”），并无可厚非，甚至是必须的。但若因此把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及其建设人为地割裂开来，不仅在学理上难以说得通，而且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实践也可能产生误导，最终不利于“双一流”建设及其目标的达成。所以，当前亟需从认识层面上进一步明确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内在本质联系和“双一流”建设的一体联动关系，避免政策的误读；从实践层面上也要精准把握和正确理解“双一流”建设政策释放出的信息，力求避免由于误读政策而出现的行动误导，始终“坚持以学科为基础”，牢牢抓住学科建设这一龙头，来促进和带动大学的全面建设和发展。

通过对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关系的实然状态的简要分析，实际上也为如何思考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向度，即以一流学科建设为基础，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当一流学科的建设成果丰富到“一定程度”，世界一流大学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而所谓的“一定程度”，既有数量

上的意义，即通过建设，世界一流学科达到一定数量以后，大学便自然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同时也有非数量上的意义，从对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关系的状态分析中也可看出，有些大学一流学科虽不多，但仍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甚至顶尖大学之列。这一非数量意义的“一定程度”，实际上也昭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不同选择和多样选择，即如何根据各大学的性质与定位来选择重点建设的学科及其路径。正如《总体方案》所指出的“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合理选择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

此外，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需要一个可依据的标准以明确和引导建设方向，而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便可以是这样一个标准。但由于各大学排行榜的指标存在一定的差异，以至大学的排名也不尽相同，如进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前100名的中国大学有4所，进入QS前100名的中国大学有9所，而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排行榜中，却没有中国大学进入前100名。应当说，大学排行榜的指标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对现代大学建设的认识及其价值理性的不同。因此，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选择对标的大学排行榜

或指标就显得尤其重要。笔者认为，对大学排行榜的选择，其主要依据在于排行榜所设立的指标是否符合现代大学发展的方向，是否遵循了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当前一些大学在选择对标的排行榜时往往依据的是该排行榜是否将其排名靠前、是否有利，这种选择取向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显然是无益的。值得提及的是，大学排行榜并不能（会）将涉及到一些大学内涵发

展状态的因素排位出来，如体制机制、大学文化等内涵因素是难以用量化方式作简单排名，而这些内涵因素对于一流大学建设又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把大学排行榜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方向的缺陷所在且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摘编自《探索与争鸣》2016.07.13

天大教改 2018 年起全面实施大类招生

记者 段玮

打破本、硕、博的“身份”限制，实行贯通式培养；打破“专业”的限制，按大类招生；实行“无门槛”的专业转出机制；实行完全学分制，从 2018 年起，天津大学将全面实施“一流本科教育 2030 行动计划”。

打破本、硕、博的“身份”限制，实行贯通式培养；打破“专业”的限制，按大类招生；实行“无门槛”的专业转出机制；实行完全学分制，从 2018 年起，天津大学将全面实施“一流本科教育 2030 行动计划”（以下简称“2030 行动计划”）。“2030 行动计划”包括“一个中心、两个阶段、三个坚持、十项举措”。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实施大类招生选拔机制、主修专业确认机制、学分制教学运行模式，建立本研贯通人才培养模式等一系列本科教育综合改革方案的推出。11 月 18 日，该校召开的天津大学第八次教学工作会上，“2030 行动计划”正式发布。

据悉，“2030 行动计划”中，“一个中心”是指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两个阶段”是指到 2020 年初步形成世界一

流本科教育体系，到 2030 年全面达到世界一流本科教育水平；“三个坚持”是指坚持立德树人、坚持通专融合、坚持贯通培养。“十项举措”则包含了十项改革的具体措施。

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中，首要强调的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建立学科专业优化和大类招生选拔两个机制，转变“学科导向”的单一专业设置模式，主动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做“新工科”建设的“领头雁”。据悉，目前天津大学已开始整合招生专业，并从 2018 年起全面实施大类招生选拔机制。全面实施大类招生后，后续专业分流和培养将充分尊重学生意愿，最大程度满足学生专业需求。同时在招生

计划分配中，也将在既有规模基础上实行动态调整。按大类招生后，天津大学将按大类推出若干个工科试验班，以及经济管理试验班、社会科学试验班、医学试验班、人文科学试验班、求是卓越班等，着眼于跨学科、新兴交叉学科和新工科复合卓越人才的培养。

与此同时，天津大学将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全面实施本研贯通人才培养模式、主修专业确认和转专业新模式、学分制教学运行模式。

贯通人才培养模式将实现培养方案贯通、课程体系贯通、运行模式贯通、导师培养贯通。这也就意味着，本、硕、博打破身份障碍，纵向跨层次选课、横向跨学科选课成为可能。学生按兴趣、学习能力选课修课得到支持，本科生也可以根据兴趣选学研究生阶段的课程，而研究生也可以通过选修本科课程来强化专业基础知识。

“2030 行动计划”还强调，在学生主修专业确认和转专业方面也将实行全新的模式。按大类招生的学生，在大一入校后将有两轮确认自己主修专业的机会。第一轮是大类内的专业确认，第二轮则可提出类内或者跨类专业的申请。在学生转专业的过程中实施“转出无门槛，转入有要求”的制度，给予学生更

大的专业选择自主权。

与上述改革措施相呼应的是完全学分制的实施。此项改革以灵活选课制为核心，形成弹性学制、主辅修制、学分互认制、学业导师制、免修免听制等构成的新型教学管理体系。学生可通过自主安排学习进程、自主选择课程层次、自主选择听课方式等实现课程的自主修读，优化知识结构，全面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与此同时，“2030 行动计划”还通过完善通专融合课程体系、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完善教师教学发展体系、完善教学保障体系四大体系的建设获得全面支撑。

“2030 行动计划”的推出，是天津大学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举措。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天津大学在其 120 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始终坚持以“兴学强国”为使命，发扬“爱国奉献”的传统，继承和发展“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双严方针”，牢固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全面深化本科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着力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2030 行动计划”，也将本着“强工、厚理、振文、兴医”的综合发展理念，以“新工科”建设为契机，以“本研贯通人才培养”为牵引，

促进理、工、经、管、文、法、医、艺术、教育、哲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天大品格”的人才培养体系。

—摘编自《北方网》2017.11.18

深化创新能力培养，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复旦大学紧紧围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要求，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大力推进并深化全校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在学校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实现了复旦大学研究生教育综合实力的持续提升。

研究生教育既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科研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校整体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校紧紧围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要求，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大力推进并深化全校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在学校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实现了我校研究生教育综合实力的持续提升。

研究生教育总体形势良好 综合改革稳步推进

近年，在研究生教育改革全面迈入“质量时代”的背景下，我校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为核心，以调整结构、主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主线，以构建质量评价和保障体系为着力点；

通过“问题驱动型”质量检查，发现制约创新能力培养的关键问题。同时，以改革投入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为抓手，通过推行优化研究生类型结构、推进博士生“申请—考核”制改革、推广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和长学制培养模式、个性化定制研究生培养方案、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重视导师培训、切实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全面推进研究生招生和培养体系、质量保障体系及管理服务体系建设。以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为契机，逐步在研究生教育发展方式、类型结构、培养模式、评价机制等方面实现根本转变，到2020年基本建成培养质量明显提高、创新人才不断涌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和复旦特色的研究生教育新体系。

目前，我校在校研究生数量稳步增

长，各类研究生结构比例更趋合理，研究生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的质量不断提高。根据学校整体布局，科学、合理调配研究生教育资源，积极支持、满足重点领域、重点学科、重大科研项目发展需求。研究生在国内外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稳步提升，表现出巨大科研潜力。

推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改革 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

2014年11月，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研究生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学校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进行了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并结合我校研究生教育实际，制定了《复旦大学研究生奖助方案实施办法（暂行）》。研究生奖助体系由各类奖学金、生活津贴、三助岗位津贴、困难补助、国家助学贷款等五部分组成。学校根据财政拨款、学费收入及学校财力情况动态调整奖助标准。

经过几年努力，逐步建立健全了以政府投入为主，研究生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院系、导师等多渠道筹集经费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进一步明确了学校、导师在研究生教育中的责任和权利，激发了导师、研究生两个主体的能动性，充分发挥了奖助学金对研究生的激励与资助作用，促进了研究生培养

质量的提高。

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有效提升研究生 学术创新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

探索研究生培养新模式。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加强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加强培养过程质量管理，强化研究生分类培养：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以提高学术创新能力为目标，强化全面系统的科研训练；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以满足职业需求、提高创新创业能力为目标，积极探索教育教学新模式。我校牵头探索建立的“5+3”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荣获2014年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组织编写完成《研究生学术道德案例教育读本》一书，开设一批学术规范与职业伦理类课程，连续开展学术规范宣传专题教育活动。

探索本研贯通培养模式，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之路。2013年，我校开始探讨拔尖创新人才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模式，探索实现真正的贯通培养：课程贯通、科学研究贯通、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贯通、学位层次贯通。经反复研讨、甄选，在新闻学院的新闻与传播专业（新媒体方向）、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公共政策专业、生命科学学院的生物学、微电子学院的集成电路专业、

上海医学院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和药学院的临床药学专业率先开始推行本、硕、博贯通培养,其中新媒体方向硕士和生物医学工程硕士要求必须是跨学科招生。值得一提的是,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从2015年实习实践开始,成为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的建院技术骨干。

加强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推进“十三五”课程建设规划的落实、执行,深入推进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开设研究生 FIST (Fudan Intensive Summer Teaching, “复旦大学夏季集中式授课”,简称 FIST) 课程;推进一级学科课程体系、专业学位类别课程体系和特色课程建设;改革外语教学,加强研究生外语听说能力、写作能力、待人接物能力训练,贯通硕士、博士外语课程学习,完成多个一级学科研究生课程体系梳理工作和特色课程建设工作试点,不断推进研究生公共选修课程建设。

加强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从2016级研究生开始,全面签署《研究生遵守管理规定与学术规范承诺书》,切实保障研究生和学校双方利益。启动研究生学籍清理工作,整肃学纪、学风。全面梳理、修订研究生培养工作文件,学籍管理、课程和教学管理、培养过程管理方面的文

件于2017年9月起开始执行。

持续推进研究生专业学位实践基地建设。在市教委支持下,进一步加强了我校“上海市优秀示范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等项目建设。着手修订了研究生专业实践基地建设和管理办法的若干文件。

多渠道构建质量保障机制 提升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

优化学科布局、调整学科结构,对自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重新论证。启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对现有学位授权点进行全方位问题诊断与分析。强化学位论文质量控制,在全校范围内推行相似度检测工作,制定了新的盲审异议处理办法,建立起将学位论文质量与招生资源配置相结合的联动机制。推动导师遴选机制改革,充分发挥院系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的自主性,由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各院系在统筹规划人力资源的基础上自行制订博导任职资格的遴选方案,设定适合本学科特色的遴选条件和标准。

新制定并发布了《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以此为依据对《复旦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基础性文件进行修订,并发布了一批新修订的针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把关的操作性

文件，从而对我校学位授予工作进行系统性的规范完善。根据国家新的学位管理政策，自主设计了“复旦版”学位证书，新版学位证书以灰色为主色调，通过校训、校徽、云纹等元素展现复旦特色，具有端庄典雅、简洁大气的特有风格，已于 2016 年起开始使用。

根据教育部布置的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要求，2015 年底，全面启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与此同时，2016 年研究生院还完成了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并积极配合学校发展规划处组织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

自 2014 年起，研究生院在全国率先开展了问题导向型“研究生培养质量大检查”。通过邀请校外学科专家、管理专家和德育专家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访谈，以此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状态，以及院系管理和导师培养的真实状态。检查工作连续实施了三年，2016 年完成对全校 40 个专业学位/领域在读研究生的质量检查，形成《复旦大学 2016 年研究生培养质量检查报告》。

建立研究生服务中心 和研究生导师服务中心 切实提高管理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我校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复旦大

学研究生服务中心，为校内外师生提供一站式服务。2016 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服务中心获评全校“文明窗口”称号。

自 2014 年 6 月正式对外办公以来，全年无休。目前实现了在校生成绩单和学籍证明申请、缴费、打印所有操作都可以在网上和自助打印终端完成，真正实现 24 小时全天候随时为师生服务，受到师生好评。

研究生导师服务中心的成立是研究生院继“复旦大学研究生服务中心”成立后的重要改革举措，对研究生院进一步转变机关职能、搭建服务平台、实现服务与管理并重、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有着重要意义。论文写作服务分中心整合校内外教学资源，通过免费开设各类课程、举办科技论文竞赛、与相关杂志合作等多种形式，充分引导和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能力，为研究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和训练机会。创建研究生职业技能教育分中心，通过开设“复旦大学研究生职业技能 ABC 培训课程”等形式，在课堂教学和科研活动之外，实施促进研究生职业能力提升的新举措。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研究生信息系统，有效提高了我校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的科学性、准确性和便捷性。

—摘编自《复旦大学》2017.10.20

研究生教育学之省思

天津大学研究生院 张立迁

早在本世纪初，关于“研究生教育学”究竟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或是一个学派，国内不少学者已开始专精覃思，并进行了大量相关研究。

研究生教育学“是不是” 一门“学”

早在本世纪初，关于“研究生教育学”究竟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或是一个学派，国内不少学者已开始专精覃思，并进行了大量相关研究。至 2015 年，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率先在全国自设目录外二级学科招收“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生，成为了专业化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和研究高地，并再次掀起了一股“学”研究热潮。那么，研究生教育学究竟“是不是”一门“学”呢？

其一，从知识发展的视角来审视，溯至中世纪，知识呈现更多上升为宗教、哲学，处于与世隔绝的超然状态，是上层精英阶层的特权和自娱自乐的工具，是基于兴趣自发结合成共同的志趣团体。现代研究生教育最早形成于 19 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大学，此前的一段历史时期至今，知识

逻辑已是一种显性结构，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知识的探索与科研发现，以追求对事物的理性认识为价值取向，期望把握世界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研究生教育研究已经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存在并发展着，且已形成了与高等教育学颇为不同的一些独有特点及问题域。譬如，以独立研究能力为培养目标的独特要求；依托高水平科研项目进行高层次人才培养，丰富科研体验的育人实效寓于科研课题中；研究生导师的一对一指导方式及师生互动关系；学科育人与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基于高深学问探究的专业化教育；创生知识与知识生产的学者式能力等等。

其二，就学科发展的规律来看，研究生教育学属于外生学科，其诞生并非学科自然生长和分化的结果，而是基于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应运而生的。随着研究生教育实践中蕴含的丰富学术要素、学科品性和社会关系内涵不

断被挖掘，依“研究生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对形形色色的需求进行“鉴别、抉择”之时，学科意识的觉醒与强化便显得尤为重要了。事实上，学科因需求设立，“学”因需要而繁荣。这显然与当前网络空间安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学科正因“需”而新立，并在诸多高校启动学科建制化人才培养有着异曲同工之理。

其三，于现实发展的演进来谈，当今国内外研究生教育规模快速增长，不少一流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已成为高校的最大主体，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呈现普遍上移趋势。鉴于此，唯有以“学”之面目问世，才能真正深入至研究生教育肌理之中，进而获得对研究生教育世界的规律性认知和创新性灼见，方能应对研究生教育的蓬勃发展态势，使研究生教育显得更加生机盎然、更为规范体系、更富现代意义。同时，在理论与实践的互联互通中不断建构新的理论体系，不断指导着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实践。

故而，研究生教育学是适应了知识发展、学科发展和现实发展的三重需要的应需之举，以“有为”争“有位”。唯有立“学科”之位，对研究生教育开展系统而专门的“学”研究，才能构筑起自成体系的“家园”，助力于研究生

教育质量提升，支撑研究生教育强国体系建设，乃应时之策。

研究生教育学究竟“是怎样” 的一门“学”

学科制度作为一种亚制度，指人们在学科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规范，故依照学科建制化过程，从下述几个方面来解读“学”之“内涵”。

1. 研究对象和任务。对于一门“学”而言，生死攸关的问题便是明确自身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研究生教育学是一门关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学问，以研究生教育生活及现实的研究生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既关注研究生的基本价值问题，又关涉其对应的广泛研究领域及专业属性，改进研究生教育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融合。

研究任务则是坚持为研究对象服务，在尚未形成成熟学科体系的当下，对研究对象进行专精甄选，发挥好“守门人”角色，聚焦于研究生教育领域生发的科学事实，探寻那些具备一定科学性和应用价值的系列真问题。同时，紧密结合研究生教育实践，与实践对话交流，形成一批应用核心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典型范例，催生知识管理新范式，为学科不断注入新动能和新内涵。

2. 研究队伍。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的队伍是非常庞大的，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从事研究生教育工作实践的教育行政人员、高校管理者；二是依托已有（高等）教育学的研究生教育方向或自设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的广大导师及培养出的“科班”研究生；三是对研究生教育感兴趣的各学科领域（如教育学、管理学、医学、工学等）的专家、研究生。此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方面的民间学术组织——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在研究队伍专业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研究队伍建设中有这样一个“金”字标准，即是否能对该学科领域的高水平研究人员产生强大的向心力，是衡量该学科是否真正形成自身特色的重要表征，也是该学科保持强劲竞争力和持久竞争优势的最有力体现。

3. 研究方式。研究生教育学源于知识发展、学科发展和现实发展的三重需要，围绕研究生教育实践的系列问题而展开，通过探寻规律、抽象升华为应用性理论，基于认识论的解释框架下，以该学科特有的方式和特定的知识系统通过逻辑演绎、实证分析、人文理解、比较研究等研究范式，合理诠释其中的客观学术性，使之具有基础性、普适性和解释力，将其转化为管理实践中的理念与智识。

鉴于研究生教育本身的高端引领性的学科特色，故而绝不能陷入“一事一议”式的研究特色，故而绝不能陷入“一事一议”式的研究方式，而应突破原有的学科领域，超越学科制度本身，超出原有知识体系所阐发的基本范畴，以更宽广视野来研究研究生教育。将研究生教育活动与理论抽象内生性关联起来，获取一整套稳定的一般化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不断树立自身学科（领域）的话语权威，再进一步对实践进行解释、预测、指导和规范。

4. 研究属性。如今，伴随知识社会中知识情境化的加深，所有科学活动都难以回避应用性。加之，研究生教育本身源于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基于实践理性解决了一个个现实问题，创造性地丰富着研究生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或领域）的知识体系和应用价值。应用性是了解与洞悉研究生教育的一把钥匙，也将构筑成为研究生教育的一项基本属性。

其一，高校是研究生教育的培养主体。现代研究生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政府、企业、社会和大学以一种相互嵌入的网络化存在方式获得自身发展。在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之路上，高校以开放办学姿态，发挥政府智囊智

库作用，与产业协同融合，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科学社会化和产业的科学化。其二，从人才培养角度看，研究生教育专业学位（应用型）人才培养、职业教育的“高职本硕”衔接、专业学位博士快速扩张，表征“应用性”正成为新时期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的关键词与重点发展路向。其三，虽说主宰学者工作生活的力量是学科，但研究生教育学中讲求应用的学者最具话语权。当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其行为方式表现为一种基于理性思考的实践，蕴含着思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气质，在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其四，应用本身既是一种知识的转化，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知识的生产，更加契合了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特性，捍卫了研究生教育学在学科之林中的独立地位。

如何发展好研究生教育学 这门“学”

1. 秉持两大立场：实践立场和人学立场。基于上述讨论，在如何发展好研究生教育学的关键问题上，首先应认清愿景使命，为研究生教育学的灵性发展廓清道路。回到“研究生教育学”这个专有词汇上来解读，即通过实践立场，使研究生成为“研究”生，这是现代研

究生教育学的学科使命；通过人学立场，立德树人的目标愿景，使研究生成为研究“生”，养成独立人格并塑造独立研究能力，确保“人”的在场。

倘说实践作为研究生教育学的一种核心手段，人学作为研究生教育学的终极目的，这两大立场的有机融合，将实现研究生教育学之手段与目的的高度统一，也是学科信仰的根基之所在。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一种理论的产生必然有其现实基础，研究生教育的创新成果需一段时间的社会实践检验，在研究生教育实践中保持批判向度，透过实践投射到研究框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而提高问题研究的应用能力。另外，鉴于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这些“人”发生密致联系，故应超越“实用心态”、“技术化路线”，将知识框架纳入人类心理和灵魂领域，体验“学”的人学价值和精神意义，聚合到学科社群中推动共同体建设。归总来讲，研究生教育为满足个体需要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促使实践者理性自主地支配教育行为从不合理性到合理性，从无知、经验到理解、省思转化。

2. 坚持二维向度：学科建设和应用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已日渐步入科学化轨道，形成依自身逻辑运行的模式，

创造出的一套公认的“意义”体系显得尤其迫切。基于此，研究生教育学应走两条并行不悖的路线，实现在“学科建设”和“应用研究”这二维向度的协同发展，促进知识体系的内在自洽。

一方面是坚持学科建设不放松，这反映学科发展自我意识问题，决定是否有良好的学科信仰，是否秉持学术研究逻辑这个内在基因。从学科属性来看，作为新兴的研究生教育学，精准而专业地表达真正的学科价值，不仅要有知识体系支撑和基础理论统摄，更重要的是需要进一步解答中国研究生教育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这也是作为一门“学”得以扎根之根本；另一方面则是应用研究，研究生教育与其他教育层次的根本区别是在于其培养人才的“高层次性”，因此，研究生将始终处于知识社会的最前沿，它对知识变革的敏锐性要远远高于其他层次教育。解决好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走出研究生教育的单一领地，将会助益于创新相关各领域的驱动发展，实现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转移，无疑这也是作为一门“学”体现旺盛活力之法宝。

3. 守持两类方法：跨学科方法和系统方法。其一，跨学科方法。研究生教育本身与学科制度天然关联在一起，自然

融入多学科视角。跨学科研究是未来研究生教育学立足创新的主要方法论，通过借鉴其他学科概念原理、方法与范式来分析研究生教育学理论问题，提升学术水平，建构学科文化，丰富研究生教育内涵。研究生教育学不同于纯人文社会学科，它与大量自然科学密切相关，故应超越学科崇拜，推崇跨学科研究，加之自然科学类研究生占据了研究生的较大部分，研究生教育学定然离不开自然科学逻辑及其方法体系，以增强自身的科学性和完备性。其二，系统方法。它指运用应用系统科学、系统思维、系统理论、系统工程与系统分析等，以指导研究和处理研究生教育问题的一种科学方法。由于研究生教育具有高端引领性、未来创新性等特点，故应面向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广泛领域，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系统，运用复杂性思维、多元性思维等思维方式。譬如，对待研究生招生计划、人才培养经费等资源配置流向问题时，更多考虑经济学的成本理论和利益、效用最大化立场；涉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升学就业创业时，自当多考虑社会学的冲突论和人的发展立场；涉及研究生学籍管理、学位授予标准时，更多关涉到政治学的权利和公平正义立场。

—摘编自《研究生教育论坛》2017.11.22

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范畴与构建理念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王战军

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发展视野广阔、发展空间巨大、发展前景可期。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必将助推研究生教育学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学科，推动我国成为世界上研究生教育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研究生教育学的构建，必将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走向世界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引领世界研究生教育发展。

引言

当前，我国已经建成完整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成为研究生教育大国。截至 2016 年底，我国在校研究生总数达到 258.56 万人，其中，在学研究生 198.11 万人，在职攻读研究生 58.18 万人，研究生课程班 2.27 万人。在学研究生中，博士研究生 34.20 万人，硕士研究生 163.90 万人。按学位类型区分，在校研究生中有学术学位研究生 124.48 万人，专业学位研究生 73.63 万人。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推进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创建进程，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同时，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的创建，是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机遇、新需求、新挑战，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范畴

作为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的基础性概念，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范畴是研究生教育学科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对研究生教育学学科范畴进行研究，需要明晰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内涵，界定研究生教育学与其他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阐释其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从而为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创建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1. 学科内涵

研究生教育学作为一门研究研究生教育现象和问题、揭示研究生教育规律及其运用特征的学科，是在总结研究生教育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形成的、并经过长时期的研究生教育研究积累逐步发展成的知识体系，是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基

本组成部分。它以教育学理论为根基，涵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系统科学、信息科学等多个学科，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思维、理念和方法，特别是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探究研究生教育基本理论、实践发展、制度政策等问题。

自 1981 年我国建立学位制度以来，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我国在研究生教育领域已积累了丰富的科研成果，构建了完备的知识体系，为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的创建奠定了良好基础。以 2011~2015 年为例，通过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含扩展版）的教育学期刊，以及 CNKI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的文献检索发现，2011~2015 年国内共发表有关研究生教育的学术论文 3914 篇，学位论文 1923 篇，出版学术专著 210 部。

关于研究生教育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一直滞后于研究生教育实践，现实的巨大变革与理论的薄弱甚至缺失形成了鲜明对照。破解我国研究生教育中的深层次问题，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既需要长期的实践探索，更需要我们以开放的理念、创新的思维、国际的视野，科学创建研究生教育学。与传统学科相比，研究生教育学既是一

门知识逻辑结构化的理论性学科，也是实践价值较高和指导意义较强的应用性学科。一方面它围绕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办学规律、人才培养规律等核心问题构建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它以研究生教育规律为研究对象，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才成长为目标开展学科建设，为丰富研究生教育理论提供实践来源。因此，研究生教育学的创建既要高瞻远瞩，以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建构本学科的框架体系，也要主动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探索该学科发展的现实路径，使之较快成为一门相对成熟的教育学骨干分支学科。

2. 与相邻二级学科的关系

研究生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是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技术学、教育学原理、比较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教育史等教育学的二级学科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在于都是通过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从而达到认识教育、运用教育规律的目的。而从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本质看，研究

生教育学与教育学其他二级学科之间更存在着显著性区别。本研究选取研究生教育学与高等教育学作为比较的对象，详细论述二者之间的区别，进而阐释研究生教育学的独特性。

(1) 研究生教育学是以现代学科理论构建的学科体系。依据学科的不同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分为经典学科和现代学科两个阶段。在经典学科阶段，学科的建立主要强调知识体系逻辑。在现代学科阶段，学科的建立更突出遵从社会需要逻辑。高等教育学和研究生教育学则分别是在经典学科和现代学科两种不同的学科发展阶段建立起来的。从我国高等教育学发展过程来看，主要是把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经典学科来建设的，或者说是按照经典学科的学科标准和要求来建设高等教育学的。研究生教育学则摒弃了追求经典学科的建设思路，回归到现代学科的理论框架当中，依据现代学科的理念和取向进行学科创建。研究生教育学以社会发展需要作为学科演进和发展的动力，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研究生教育中的问题，进而揭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律、育人规律和办学规律。

(2) 研究生教育学更加突出强调研究性。自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经

过近 40 年的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研究生数量持续增加，研究生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增强。截至 2016 年，我国研究生培养机构共 793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576 所，科研机构 217 所。在学研究生人数近 260 万。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使得以本科生教育为研究重心的高等教育学已经难以有效指导多层次、多类型的研究生教育实践发展。研究生教育学正是对研究生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关注中应运而生的，进而与高等教育学在研究范畴、学科问题、学科作用上相分离。与高等教育要求教育对象进行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有所不同，研究生教育在本质上不仅仅要求教育对象系统学习已有知识，更要以探索、研究为途径对知识进行探索甚至是生产。因此，研究生教育是培养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与系统学习知识的有机结合。对于研究生教育而言，在许多情况下，科研过程就是教学过程，教学过程就是研究过程，从而体现认识已知和探索未知的高度完美的结合。

(3) 研究生教育是培养更高层次人才的教育活动。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顶端，它不属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领域和范畴，更不是本科阶段简单的延

续。我国研究生教育经过长期发展，目前已形成了以硕士生教育与博士生教育有机结合、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相协调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在这一培养体系下，我国研究生教育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研究生教育以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重大战略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需求为目标，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高层次人才智力支持。因此，研究生教育是一种对个人基本素质及潜质要求最高的一种教育，也是以精英（各个领域的精英）培养为目标的教育。

3. 研究生教育学学科框架

一门学科的建立，一方面是遵循从基本问题、基本规律等方面进行探索，另一方面更要注重从学科体系，特别是理论体系方面进行研究，才能真正推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学科体系的研究和探索对于基本问题、基本关系、基本领域和基本规律的研究具有指示方向、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深入分析和系统总结我国研究生教育实践的基础上，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既要关注研究生个人等微观层面，更应囊括研究生教育战略与政策等宏观体系；既要有前瞻性、先导性和战

略性，更应有全球化的视野。

基于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层次的分析框架，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生的成长、成才与教育教学活动、科研活动的关系；研究生教育的政策与管理；研究生教育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外部环境的关系；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规律等。其中，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的核心定位是教学活动、科研活动与研究生学习、培养活动的关系和规律。鉴于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的初创及研究基础，目前该学科应着重从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生教育政策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学、研究生教育管理学、研究生教育历史学、研究生教育国际比较学等六个分支学科开展研究。

（1）研究生教育学。它是体现研究生教育学基本理论及其体系的学科。其研究内容应涵盖：研究生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生培养规律、导师制度、科研制度、课程与教学理论等。其中，研究生教育学基本理论包括研究生教育的本质、目的、原则、功能、作用、结构、模式等；研究生培养规律研究包括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培养类型、培养模式等；导师制度研究包括导师的条件和标准；导师与研究生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科研制度研究包括研究生参与科研的规

律、科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等；研究生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包括研究生课程设置的标准、依据、结构以及课程的评价，教学的基本原则、方法和手段，等等。

(2) 研究生教育政策学。教育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由公共权力部门制定，是公共政策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它是一个政党或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教育任务而制定的教育行动准则。教育政策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国家在教育领域内所采取的行动、计划与进程加以解释。研究生教育政策的研究，应以实践为取向，是为解决各种研究生教育问题服务，为有效的政策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为此，研究生教育政策学研究，要以宽阔的视野，重点围绕研究生教育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生教育政策系统、研究生教育政策过程、研究生教育政策评价以及具体的研究生教育政策等开展研究。通过研究生教育政策学的研究，以探索研究生教育政策运行规律、改善研究生教育决策系统，提高研究生教育决策质量，服务国家研究生教育重大决策。

(3)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学。开展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和评估，是建设研究生教育质量强国的主要抓手。当前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评

估学，应着重从研究生教育质量标准、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模式等方面入手，开展以下方面的相关研究：博士生和硕士生教育质量标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标准研究；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模式研究；研究生教育评估形式、类型、机制、技术与方法研究；研究生教育排名评价研究等。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学以我国已初步构建的“五位一体”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为基础，在学习并借鉴国际经验与理论之上，一定能够形成适应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现实需要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学科评估体系。

(4) 研究生教育管理学。研究生教育管理学包括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两个层面。从宏观角度开展研究生教育管理学的研究，主要包括政府对研究生教育管理的职能和定位研究；社会对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参与研究；研究生教育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研究等。微观层面上，侧重于研究生培养单位如何适应研究生教育育人规律、培养规律及组织的运行规律的要求及特点，形成科学、系统、规范的管理体系，从而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服务。

(5) 研究生教育历史学。研究生教育历史学既有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历

史的梳理与深入系统的研究，也涵盖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进程研究。它不是对研究生教育历史的简单回顾与总结，而是以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逻辑，从各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轨迹中发现和探寻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规律。因此，研究生教育历史学，既是一部研究生教育发展史、制度史，更是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思想史。

(6) 研究生教育国际比较学。这一学科主要围绕不同国家和地区研究生教育的产生背景和发展历程、发展原因和制约因素、共同之处和各种特点等方面，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分析与系统研究。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研究生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共性问题与一般规律，各国各自研究生教育的特色与个性，揭示它们之间在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异同、相互联系与影响，进而总结研究生教育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等。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研究生教育的比较研究，能够为各国（或地区）相互吸收、借鉴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经验，促进本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4. 学科人才培养层次及目标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对研究生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对高层次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强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复兴梦，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关键在人才。这就要求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者认清肩负的神圣使命，加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提高研究生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提供大量高端人才。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培养的高端人才以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为目标，他们可以充实到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社会组织等，从事与研究生教育相关的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同时，也可从事涉及研究生教育政策的政府管理部门的行政事务工作。具体而言，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的人才培养可以分为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两个层次。其中，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为我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使他们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和事务管理的高级领军人物。他们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系统的教育专业知识以及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研究生教育领域能独立开展深度研究并从事研究生教育教学活动。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为国家培养大量的

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具备宽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扎实的全面的研究生教育专业知识，具有较好的创新意识和学术素养；对研究生教育实践有一定深度的理解，初步具备独立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改革实践的能力。

研究生教育学的构建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理念集合体，是我们党深化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集中体现。它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新道路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长期健康发展，要求我们必须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加快推进研究生教育学的构建。

1. 创新发展是灵魂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国家只有把创新发展放在经济社会的核心位置，才能真正适应和引领时代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以创新发展理念引领研究生教育学的创建，要求我们

树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全球视野观之，研究生教育学的提法始自国内，而国际上尚未有相关表述。积极推动研究生教育学的创建，加快研究生教育学的发展，必将使我国占据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制高点。文献梳理显示，国内学者对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动议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和思考；热议于 21 世纪初，此阶段涌现出了一定量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是一个小高潮；重议于 2015 年，集中探讨了学科发展的方向和困境等议题。基于创新发展的角度，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的创建应更加注重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让创新理念贯穿研究生教育学发展的始终。研究生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其创建和发展路径是以研究生教育问题为出发点，遵循知识生产模式 II 的基本逻辑，注重在应用的环境下运用交叉学科方法、通过协作的方式进行知识生产，进而构建学科知识体系。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从研究生教育大国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的战略转型期，迫切需要理论知识的引领，指导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和发展。同时，研究生教育学术界需要高层次研究人才以支撑学科的

创新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健康发展和创新变革亟待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创建和智力支撑。

2. 协调发展是路径

协调发展理念作为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为理顺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发展效能提供了根本遵循路径。以协调发展理念为指导创建研究生教育学，就是要把握好学科的总体布局，协调好各分支学科之间的战略布局，加强研究学者、管理专家、博士生、硕士生之间的协同配合，众创“研究生教育学”。作为一门准学科，研究生教育学的创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这就决定了这条学科发展之路必将是漫长的。在现代社会，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知识的不确定性都显著增强，对于研究生教育学这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而言，这种状况尤为突出。为此，基于协调发展理念，研究生教育学的创建需要协调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要极为重视跨学科、跨领域知识的综合协调，其中包括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系统科学等。二是要协调教育研究专家、其他学科领域专家、研究生教育管理专家、研究生教育实践领域的专家和研究生等人员，协同攻关、协作配合，针对研究生教育

问题展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

3. 绿色发展是保障

绿色发展理念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有机结合，深刻体现了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研究生教育学创建，必须以“绿色”为主旨，遵循教育规律，培育良好学科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①研究生教育学的创建既要遵循新兴学科发展的规律，即以问题研究为导向，同时要兼顾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律、办学规律、育人规律等。②研究生教育学的创建要营造良好的研究生态，包括学术的生态环境和学者良好合作交流的环境。③研究生教育学要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特别是要注重构造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有力的学科发展制度支撑，从而打造研究生教育学学术共同体。

4. 开放发展是宗旨

开放发展理念作为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内外发展联动的行动指南，必将进一步拓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拓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助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

目标。开放发展理念下研究生教育学的创建，既要加强我国研究生教育问题研究，更要关注国际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以本土和国际“两条腿”走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实践已深度融入国际化、全球化的进程。这种状况对研究生教育发展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它要求研究生教育学必须对此有所研究和回应。特别是当前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我们必须以中国国情为基本出发点，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探索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道路。研究生教育学的创建要建立在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实践基础上，基于本土特色和优势，以开放的视野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在开放的生态环境中，研究生教育学的创建要与国际上的研究生教育研究专家保持合作，共同展开科学研究，才能达成学科国际共识，从而加速研究生教育学的发展。

5. 共享发展是关键

习近平同志指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届五

中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是新形势下推动我国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基本遵循。遵循共享的发展理念，要求研究生教育学的创建必须依靠广大学者集体的共识和智慧，共同合作、共同创造，从而使参与研究的学者共享研究成果。同时，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推动着信息经济深度融合，而共享经济被推到前台，成为信息经济中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其典型特征——共享是效益的基本来源。对于研究生教育学这样一门新的准学科，其创建不仅要顺应当前的社会发展趋势，更要打破传统的教育学科发展之路。为此，研究生教育学应着重加强学科共享平台建设，构建共享机制。其中共享平台包括：信息平台、学术会议、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学术期刊等；共享内容包括理论、方法、模式、信息等诸方面。通过共享，加快推动研究生教育实践理论化和理论知识成果及时、即时的扩散传播，有利于创建研究生教育学。

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处于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核心任务，从研究生教育大国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的战略转型期。一方面，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转型亟须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构建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促使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站

到国际学术前沿，进而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因此，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发展视野广阔、发展空间巨大、发展前景可期。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必将助推研究生教育学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一流学科，推动我国成为世界上研究生教育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研究生教育学的构建，必将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走向世界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引领世界研究生教育发展。

—摘编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7.05.18

研究生教育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记者 王之康

大学应主动适应并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才有生存权和生命力”的外部规律，以及“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应按教育规律、教学规律办学，而不能按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办学”的内部规律。

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来说，2017年是不平凡的，因为40年前的1977年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使我国研究生教育在中断了12年之后得以恢复。

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四十不惑”之说。如今，恢复研究生教育已经到了不惑之年，那么在这40年中，我国研究生教育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哪些成就？接下来又该如何更好地发展？

追溯：两大分界与四个阶段

可以说，我国研究生教育有两大分水岭，一个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另一个则是1977年恢复研究生教育。

据统计资料显示，1949年新中国成

立之前，研究生教育发展落后而且缓慢，1935年至1949年共举行了9届学位考试，授予硕士学位232人。新中国成立之后，研究生教育才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其间也经历了不少坎坷曲折。对此，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杨德广曾撰文，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分为八个阶段。以1977年为界，前后各四个发展阶段，后者包括1977年至1985年的恢复期、1986年至1998年的改革发展期、1999年至2009年的大发展期以及2010年之后调整研究生结构、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期。

1980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后，国务院与学位委员会又制定了《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关于审定学位授予单位的原则和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进一步

明确了学位授予的负责单位，学位中新的原则程序，学位的课程、学分要求，论文的答辩流程、规范等，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迅速恢复发展。

1986年，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提出“稳步发展，保证质量”的方针，明确在控制数量的同时，重点要调整好结构，培养模式应多样化。杨德广认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从此开始突破传统的重基础、重理论的单一模式，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

1999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我国研究生教育也迎来了大发展期。据统计，199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为9.22万人，比1998年增长了30%，在校研究生也从1998年的19.89万人发展到2009年的140.49万人。

在杨德广看来，2010年以后，我国进一步调整研究生结构，迎来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大力发展。其实，早在1991年，我国就设置了第一个硕士专业学位——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之后，经过1992年正式建立专业学位制、1996年审议通过《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1999年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专业学位教育的若干意见》等，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得以快速发展。

成就：培养规模与制度体系

40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取得了诸多成就。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看来，这些成就首先就表现在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上。

据统计，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这17年间，我国一共招收的研究生人数不到2.4万，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时，招生人数也仅为1.07万，而在2011年，招生人数已经达到了56.02万，是这17年招生总数的23.3倍。

“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已经达到200多万，成为世界上的研究生教育大国，为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高层次人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沈文钦说，研究生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才不仅充实了高校的师资队伍，同时也成为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人力资源支撑，在卫星上天、高铁建设等重大工程中，均有大量研究生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

不难想象，在这些事实的背后，不仅是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大幅提升，也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

而上世纪80年代初学位制度的建立，也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开始

进入制度化阶段。可以说，我国研究生教育至今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

在学位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的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和学位授权体系基本形成，建立了学科门类齐全、结构布局相对合理的学位授权体系，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拥有了硕士授予单位；学位授予类型既有学术学位也有专业学位，学位获取既可以通过考试（推荐）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也可以通过自学或其他学习方式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学位。

在研究生教育管理方面，形成了职能和权限分明的中央、地方政府和培养单位三级管理体制。其中，中央研究生管理部门起主导作用，地方政府在本地区研究生教育的统筹、学科建设、学位授予、质量监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培养单位则在有关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环节拥有相当的自主权。

此外，我国研究生法规体系也逐渐完备，一系列与研究生教育相关的组织机构相继建立，如1994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成立，1999年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成立，2003年成立了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等。

探秘：国家投入与系列改革

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就，要得益于我国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些有益探索。而在这些探索中，沈文钦认为，首先就表现在国家“重视对研究生教育的投入”。

其实早在1979年，教育部就提出了在研究生招生中要坚持“择优录取、确保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为此，国家在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建设、科研条件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对研究生导师资格设定了严格的审批程序，同时还采用了多种质量评估方式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如1995年针对博士、硕士授权点的合格评估与选优评估，1998年针对博士学位论文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选优评估等。

同时，“985工程”“211工程”和其他一些重大计划的实施，也使得一批重点高校、重点学科与博士点的整体实力显著提高，有力地保证了博士培养质量的整体水平。

“随着我国对科研经费投入的加大，更多的博士生获得了参与课题研究的机会。”沈文钦告诉记者，他曾参与做过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5%的博士生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导师的课题中，“而随着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博士生的资助水平也大幅提高，使他们能够依靠资助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以 2015 年为例，国家奖学金共奖励硕士研究生 3.5 万人、资助金额 7 亿元，奖励博士研究生 1 万人、资助金额 3 亿元；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共奖励研究生 100.31 万人、资助金额 70.41 亿元；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 314.23 万人、资助金额 106.11 亿元；研究生“三助”岗位津贴资助 137.43 万人、资助金额 36.33 亿元。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研究生“三助”比上一年度分别增加 50.43 亿元、31.36 亿元、7.49 亿元。

“此外，我国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与探索，并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稳妥做法，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沈文钦说，例如博士生导师的审批权最早归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后来下放给各个高校；一开始只有教授才有资格指导博士生，后来清华大学等研究型大学改革了博士生导师制度，允许助理教授指导博士生；在招生制度方面，近些年很多高校也开始尝试探索申请审核制等。

那么接下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又该如何更好地发展，以推动质量再提升呢？

发展：两个规律与自主办学

“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历程，昭示着它与社会现状相适应，由社会政治经济所决定。”杨德广认为，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教育因社会的存在而存在，不可能脱离社会、远离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

我国“教育学泰斗”、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曾提出高等教育的“两个规律”，即“大学应主动适应并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才有生存权和生命力”的外部规律，以及“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应按教育规律、教学规律办学，而不能按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办学”的内部规律。在杨德广看来，作为大学教育一部分的研究生教育，也应该符合这“两个规律”。

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表示，我国要想真正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需要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同时推进高校的现代治理，要把本科教学、研究生教学这类教育事务全部交给教授委员会管理、决策，对每个教师的教学、学术评价实行同行评价而不是行政主导的评价。

“这样才能让课程和学术研究都注重品质，并结合不同的培养定位，对学生提出不同的培养要求。”熊丙奇说，对于学术型研究生，在课程之外提供更多科研机会，让学生在科研中提升学术能力；对于专业型研究生，在完成所有高质量的课程学习后，不必参与科研项目，撰写好论文即可毕业。

“只有实行学术自治，高校才能切实建立起导师制。”在熊丙奇看来，我

国现在虽有导师制，但导师一方面在行政评审和考核中已经失去对教育和学术理想的追求，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用自己的声誉对学生质量负责的意识——在研究生招生、培养、毕业中，导师并无多大话语权。“这是我国教育部门和学校必须切实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中国科技报》2017.10.24

图 书 推 介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 40 多篇作者近些年来思考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文章，作者试图从深层次上乃至根基上去剖析当前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大问题和根本问题，有许多见解独特、深刻，对当前教育界有重要的启示。作者尤其关切的是：教育的宗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从什么意义上理解教育？又应该从何种意义上理解教育？长期以来，我们奉行的教育模式是否不自觉地把学生当成工具培养？是否应该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人的意义上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模式？中国大学是否只是扮演工具的角色？是否应该有更大的担当？是否应该引领社会进步？为了使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转变为现代的人格，教育该做什么？为社会广为关注的行政化问题到底如何解决？

作者简介

李培根，1948 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1987 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获博士学位。2003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 年 3 月-2014 年 3 月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共十七大代表，十一届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目前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图书名称：认识大学

作 者：李培根

出 版 社：商务印书馆